

从《御览诗》看元和诗坛风尚

高 翀 骅

(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 上海 200062)

摘 要:《御览诗》为现存少数唐人选集的一种。编者令狐楚在中晚唐之交的政坛、文坛上均有相当地位和影响,其奉诏纂进的《御览诗》在文学史上也应有其特殊地位和价值。从对诗歌体裁的选择、对诗人的选择和对诗歌的选择三方面入手,可以看到:《御览诗》虽多取大历、贞元诗人作品,倡导的却不是声浮气薄的大历风气,从其对气格和风情的追求上都体现出元和诗坛的风尚。《御览诗》可作为一个特殊的出发点来考察元和诗风走向。

关键词:唐诗;御览诗;令狐楚;元和;体裁;风格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579 (2006) 01-0079-06

唐宪宗元和十二年,翰林学士兼中书舍人令狐楚集刘方平、皇甫冉等三十名诗人的三百余首诗歌为一卷,奉敕纂进,名曰《御览诗》。就诗史之地位而言,《御览诗》的声望影响不及同为唐人选集的《河岳英灵集》、《篋中集》等,后世论者多以“轻艳”目之。而“轻艳”的风格,不仅长久以来游离于正统文学所推崇的温柔敦厚之外,也和文学史所描述的以韩孟之奇崛和元白之疏快为主导的中唐文风不甚相符;但从复原历史之旧观的角度来看,这本上承帝王旨意,下秉学士取舍的诗选应可作为进一步细化剖析中唐诗坛发展脉络的途径和证明而具一定价值。

本文拟从对诗歌体裁的选择、对诗人的选择及对诗歌的选择三个角度对该选本作一番考察,并对《御览诗》所折射出的诗坛风尚稍作阐述。

南宋陆游为《御览诗》题跋时记载:“《御览》一名《唐新诗》,又名《选进集》,又名《元和御览》”。^[1](p.255)]其中《唐新诗》这个名称是针对选本收录诗歌的体裁特色而言的。《御览诗》现存的二百八十六首诗歌均为近体诗,其中五律 108 首,占 38%,五绝 64 首,占 22%,七律 12 首,占 4%,

七绝 101 首,占 35%。撇开唯一的三韵五言诗不论,七言律诗入选数目所占的比例明显低于其他体裁。那么,该选集何以“仅收入近体”和“七律入选极少”呢?

就近体诗本身的质性而论,其在篇幅、声韵、对偶上的诸多限制使之比古诗更适用于需要在有限时间内考验诗人诗才的场合——不但唐代科举取士以五言十二句的长律为考试科目,赠别赠答的交往诗和席间的唱酬也多用近体。同时,近体诗篇幅较短,利于记忆;讲求声律,便于吟咏,甚而入乐传唱,易于借助音乐流通的渠道传播。如此一来,无论是科举,抑或是依附权门、以诗干进,甚至于在闾里巷间取得声望都需要掌握写好近体诗的技能,由是,近体诗作为一种工具,成为一种趋势而受到热心于功名的唐朝人的瞩目并得到大量尝试和运用就很容易理解了。现存的中唐近体诗数目数倍于古诗,和初盛唐的近古体比例相较,比重差距不断拉大便是证明。^[2]

再从重要诗人的创作来看,细察元和这十五年的诗风演化,韩愈兴复古思潮,与孟郊联句赠答均在贞元末元和初,元白之兴新乐府运动则在元和四左右,随后两大高潮渐趋式微。不仅元白倾向近体诗创作,多杯酒光景间之小碎篇章,连被白居易

称为“才高笑小诗”^[3]的韩愈在元和十年左右也写了相当数量的近体律诗，故元稹有“喜闻韩古调，兼爱近诗篇”^[4]之戏说。可见到了《御览诗》编选的元和中期，近体诗的声势之盛，连诗坛的巨擘也不能免俗。

最后让我们从一些唐人选唐诗的选本来看，殷璠的《河岳英灵集》编于盛唐，他的宗旨是“既闲新声，复晓古体”^{[1](p.41)}，但在228首诗歌中近体诗只有56首，占总数的25%。元结的《篋中集》编于中唐初，全部为古体，是针对诗坛的风变，力图矫治而有意自立门户的，却反衬出了近体诗风靡这一变化的急遽和广泛。编于大历、建中之交的《中兴间气集》共选诗132首，其中律诗106首，占总数的近80%。到了《御览诗》，作为奉敕编撰的诗集，特选近体，则更可想见朝廷自上而下的风尚了。从以上的分析可见，中唐，特别到了元和后期近体诗繁盛的情形。而令狐楚身处以声病谐婉相尚的风气间亦不能自异。

关于《御览诗》选取的七言律诗远远少于其他体裁的现象，一方面透露出：在近体诗的发展中，即使有了杜甫的大力开拓创造，七律仍是发展稍显缓滞的一种体裁，以至到元和后期产量和质量尚不及其他诗体。

还有一个原因或许更为重要，即《御览诗》中收录的诗歌具乐府，或者更确切地说：声诗的性质。声诗为唐朝特有的音乐文学，其文字的载体为近体诗，而音乐的载体则为隋唐燕乐。借助《唐声诗》的资料，我们在《御览诗》中可找到不少声诗，如《折杨柳》、《鹧鸪词》、《采莲女》、《凉州曲》、《宫中乐》、《皇帝感》等。又据吴相洲《唐诗创作与歌诗传唱关系研究》一书所论，《唐声诗》所录尚嫌保守，有一些诗题虽属汉魏以来的旧题乐府，却依然在唐朝流传演唱^[5]，甚而将古体的形式弃去不用改制成近体的，也应列入声诗范畴。则《御览诗》中的《巫山高》、《出塞》、《入塞》、《关山月》、《长安道》、《陇头别》、《度关山》、《古别离》等便属于这种情况。选集中的两首《关山月》正是一个可看出其流变的例子，该题原咏边塞戍卒思乡之感，如集中李端那首“水冻频移幕，兵疲数望乡。只应城影外，万里共胡霜”，但到了霍总笔下，写的是“珠笼翡翠床，白皙侍中郎”，则全然和边疆乡思无涉，显然《关山月》已经是曲调名，故作者配词不必拘泥题意，这一点正和词体发展轨迹相似。再加上诗人写诗在先，乐工采诗入乐的情况，可推测：《御览诗》并非仅供案头阅览，还可

被于管乐，由宫中乐伎歌唱。而声诗中，乐工较少采用七言律诗入乐，多截其半或取其数句。考虑到《御览诗》具备入乐的性质，七律数目偏少也就可以理解了。

二

《御览诗》编于元和十二年，在这个时间点上，韩愈五十岁，柳宗元四十五岁，刘禹锡四十六岁，白居易四十六岁，元稹三十九岁，孟郊、李贺已辞世，这些最为后人推崇的诗人已创作出大量作品，尚奇尚怪，求新求变的“元和体”也已经形成。但这一时之盛况却没有在《御览诗》中体现。《四库全书总目》就说：“所录惟韦应物为天宝旧人，其余李端、司空曙等皆大历以下人，张籍、杨巨源并及于同时之人，去取凡例，不甚可解。”^{[6](p.1688-1689)}有些学者解释为令狐楚对诗人诗作的选择限定在元和之前，即入选的基本上是大历、贞元诗歌，但为何限定在元和之前同样需要一个解答。那么《御览诗》在诗人的选择上是否有另一层缘故可寻呢？

当然对诗人的选择与对诗歌其他要素的选择密切相关，比如《御览诗》入选体裁限在近体诗，则尚古风的韩派诗人必然受到较少关注。这里，笔者首先讨论时势对令狐楚取舍诗人的影响。

“御览”二字突显了该选集供奉帝王的特殊身份。“奉敕纂进”四字则更表明了唐宪宗在这本选集的形成中有着促动的意志。不同于一般选集的选家可以自由地甄别删减来体现其趣味和价值观；“引嫌避讳”四字应当是令狐楚编选时始终警醒的要素，毛晋在后记中认为选集中某些诗题的改动是出于“集柔翰以对宸严”^{[1](p.255)}的考虑，而需要规避的又何止诗题。考察元和诗坛著名诗人在当时的仕宦境遇：

元和十年，因参与永贞之变，被贬十年的柳宗元、刘禹锡因“执政有怜其才欲渐进之者”被召回，抵京不久又因“谏官争言其不可，上与武元衡亦恶之”^{[7](p.217)}而改贬更为偏远的柳州、连州。同年，白居易以越职言事贬江州司马，元和期间一直在贬所。而元稹也早在元和四年，因为执法不回触怒权贵被贬，虽于元和十年从唐州召回，同年又出为通州司马。

元和后期的这几年，上述诗人都深陷政治上不得意、被排斥的低谷，而这种因触怒执政权贵而起甚而不得皇帝欢心的不得意，和未入仕途不得施展的士人相比则更添一分险恶。在权贵的虎视眈眈下，元、白、刘、柳等诗人固然已经名负一时，佳

作连篇，其中，刘禹锡更与令狐楚已经有了二十年的诗文交往，令狐楚却不能，或应该说不敢选他们的诗歌去“面圣”。

至于韩愈则是另一番情形。元和十二年，正是蓄意削藩的唐宪宗讨淮西四年而不克，朝士多欲罢兵的关键时刻，宰相裴度独排众议，更愿自往督战，深获宪宗赏许。韩愈亦属主战一派，被奏为彰义行军司马，随裴度出征，淮西平后迁刑部侍郎。这样看来，当时韩愈倒是得志之时。但是就在这个问题上，令狐楚却归属于保守反战的一派。据《资治通鉴》记载，“李逢吉不欲讨蔡，翰林学士令狐楚与逢吉善，（裴）度恐其和中外之势以沮军事，乃请改制书数字，且言其革制失辞，壬戌，罢楚为中书舍人”。^{[7](p.206)}这个让令狐楚仕途遭受挫折的事件正发生在《御览诗》成书该年的八月，设想当时庙堂上的针锋相对，剑拔弩张之势，令狐楚当然不会将政敌的诗篇送去取悦帝王。

分析了诗史上最为显著的一些诗人诗作不得入选《御览诗》的背景，接着看一下《御览诗》中收入的一些诗人的情况。选集内收录最多的是李益的诗歌，计36首，其次是卢纶，32首，然后是杨凝（29首）、杨凭（18首）、杨凌（17首），接下去是皇甫冉（16首）和杨巨源（14首）。这些诗人的声望在今天看来远不及韩、孟、柳、刘、元、白，当时却未必如此。如李益在当时“每一篇就，乐工贿求之，被于雅乐，供奉天子”^[8]，又因“宪宗雅闻其名”而招入京为官。卢纶在世时得德宗询问召见，令和御制诗。宪宗又曾诏中书舍人张仲素访集卢纶遗文。杨氏兄弟因工诗善文有“三杨”的美称，当时“天下号为文章家”^[9]。不仅如此，李益和杨氏在政治上均与令狐楚所属的牛党相关连，而杨巨源、卢纶、李益又都曾和令狐楚有诗文交往，则无论从名望还是为本党派扩大声荣或是进贤举才的角度言，这几位诗人的作品在《御览诗》中占据的偌大比重都可以得到解释。

《御览诗》的编选被帝王喜好所牵制，也受到了诗人们在仕途上的取向及其遭遇的影响。虽然《御览诗》收入诗人的名单与后人对中唐诗坛的推想的有相当的出入，但却更为真实地向我们展现了在元和中后期，在政治文化中心，哪些诗人诗歌被官方赋予了“面圣”的荣耀，并相应的具备了影响时人的诗坛地位。

当然，《御览诗》作为一本诗歌选集，除了了解其不可避免的政治因素和当时社会条件的作用之外，更应当考求其文学上的价值和影响。

在传统的诗话和当代学者的论述中，大历诗风被归结为清淡省净，元和诗风则是尚奇尚怪，求新求变，而《御览诗》却呈现出与上述两者不尽相同的风格面貌。前人的观点大致集中为两点，其一为“富赡”，如《四库全书总目·御选唐诗》说的：

“令狐楚尚富赡，《御览诗》所录皆富赡。”^{[6](p.1727)}

其二为“轻艳”，如毛晋《御览诗》跋中说的：

“唐至元和间，风会几更。章武帝命采新诗备览，学士汇次名流，选进研艳短章三百有几。”

先说“富赡”。

前人对于“富赡”的体认，首先缘于该选集供奉天子“御览”的特殊性质。“元和”是唐诗的又一个繁荣期，也是唐帝国的中兴时期，随着削藩有绩，国势稍振，朝堂之上颇易流布着同列朝开国初期相似的绮丽鲜错的文风。与之相应，《御览诗》中便出现《皇帝感词》、《宫中乐》、《天长久词》等描述宫中行乐、颂祷君王统治长久的诗篇。这些诗歌不重“性情风旨”，而尚行文间气度之雍容和所描摹的物态之华贵。一方面满足了“御览”所需要的对帝王圣贤功德的歌颂，对太平气象，富贵风流的形容；另一方面，这些对帝城佳气葱茏的描绘，宫廷生活的铺锦列绣的刻画在读者眼中自然也是堂皇富丽，锦绣缤纷的。

二来，“富赡”也可以从令狐楚的官位显赫去理解。世运遭遇之不同会相当程度地反映到诗文中造成气象格局之别，浅薄的资历、卑微的官职，其诗文难免缺乏宝贵尊严、典重文雅性情气度。反之，如《吴礼部诗话》中说的：“武元衡、令狐楚皆以将相之重，声盖一时，其诗宏毅阔远，与灞桥驴子上所得者异也”^[10]。令狐楚的出处履历尊荣矜贵，则其所选的诗歌也必不走浅近尖新一路。

其三，相当一部分入选的诗歌在描写上丽密体贴，对景物的质性、色泽、形态刻画细致，给人以繁缛纷纭的直感，所以概括为“富赡”。如：

“叶暎黄鹂夕，花繁白雪朝”（刘方平的《折杨柳》）

“露浥红兰湿，秋凋碧绿伤”（刘方平《班婕妤》）

“暝日纱窗深且闲，含桃红日石榴殷。银瓶绁转桐花井，沉水烟销金博山。文簟象床娇倚瑟，绿套铜镜懒沾环。明朝戏去谁相伴，年少相逢狭路间。”（刘复《夏日》）

以刘复的这一首诗为例，先是用了“深”、“闲”二字写纱窗以衬闺幄之静，又用“桃”、“红”、“殷”数字渲染出窗外景致之浓丽。接着是

一系列名物器具的描绘，在色泽质地上深加着色，如“银瓶”、“金博山”、“文簟象床”、“綵奁铜镜”勾勒出居室之华美，又间带出人物之娇慵自恃的形貌，如“娇倚瑟”“嫩拈环”。这种精美居室中的美人意态的形容竟和温庭筠之词境如“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相若，而观察之细微，描写之精美，镂金错彩，丽词绮思亦不在飞卿之下，以“富赡”论之当不为过。

除上述因素外可注意的是：传统诗学对富丽气象的理解从来不停留在文字的表面。正如陈霆在《渚山堂词话》卷一中说的：“昔人谓：凡诗言富贵者，不必规规然语夫金玉锦绣，唯言气象而富贵自见，乃为真知富贵者”。富赡，不仅仅是文辞上的不涉饥寒之词，风格上不入尖仄之体，更是在行文中自有一种雍容徘徊，隽朗都丽的气度。所以笔者认为不妨将“富赡”二字的理解从诗文风格的范畴中稍稍引申到从文章气格上的充沛充裕来。

胡应麟在《诗薮》中两次用“气骨顿衰”来评价大历诗歌，这个结论用在整体诗风的走向上绝无可疑，但在《御览诗》中，无论从作品入选数量较多如李益、卢纶等诗人的诗篇里，还是从占据相当数量的题裁如羁旅、从军中，都尚保留着些许盛唐气象的余韵。

以边塞诗为例，《御览诗》中收入边塞题材的作品达54首，占到总数的18.5%，这个比例不但让《中兴间气集》（占5%）望尘莫及，还超过了《河岳英灵集》的9%。再看具体的诗人诗作：李益的诗歌常被后人赞为“气格有类盛唐者”^[11]。入选的如《盐州过胡儿饮马泉》三四两句：“几处吹笳明月夜，何人倚剑白云天”，追思古人开疆辟土之功，笳吹月中，剑倚天外，写得明快豪迈，历来被人称赏其带高健之气。《送客归振武》中“别离俱报主，路极不为赊”两句也有盛唐从军诗的慷慨自任之意在。再看卢纶的诗作，《载酒园诗话又编》称赏说：“塞下曲六首具有盛唐之音”^{[12]（p.1459）}。这六首全部入选。又如杨巨源《长城闻笛》中“夜月降羌泪，秋风老将心”两句，写笛声之感动人心，却不带惨惻悲凄之意，故许英芳在《瀛奎律髓汇评》中以为其除情致之外更有“沉雄”的气质^{[13]（p.1306）}。再如柳中庸《秋怨》中的“汉垒关山月，胡笳塞北天”，纪昀在《瀛奎律髓汇评》中评价为“出语婉约，不失雅音”。^[14]虽然说整体而言，中唐的边塞诗销去了盛唐时奋发乐观的豪迈情调，而多发消沉凄苦之音，但《御览诗》的选择却没有沉浸在这种衰顿苍老的风貌中，不少诗歌依然回荡

着盛唐气象中那浑成的风味和沉郁的情感。如果说韩愈倡导的复古是体式上的回归，而内容上追求的奇思理趣已经渐离唐声，逗入宋调，则令狐楚偏重的这份平和沉着含蓄雅致的气度倒是精神上的回溯了。

由此可见，“富赡”的风格固然和令狐楚本人的偏好相关，同时也是元和这一时代的需要。而“富赡”不仅指字面上的丰富华丽，也包括内蕴的气格沉雄，就这一点，令狐楚的取向跳脱出大历诗风的声浮气薄，也不同于韩孟一派的奇语险境，而有着对盛唐之声追溯之意。

再论轻艳一说。

就文字层面而言，轻艳应理解为描写对象、选用词藻上的绮靡精美，也包括音节上的流丽婉转，则《御览诗》中确实可以找到相当的诗作来印证这一点，如：

细酌蒲桃酒，娇歌玉树花。（刘复《春游曲》）

酒是芳菲节，人当桃李年。（柳中庸《寒食戏赠》）

卫女红妆薄，王孙白马肥。（李嘉祐《汉口春》）

而且从令狐楚对诗人的筛选上也可以看出这一倾向：比如大历诗人以钱起、郎士元最负盛名，《中兴间的气集》便将这两位诗人的诗篇分别置于其上下卷的卷首，入选诗歌数目也较多。但令狐楚并没有将他们选入《御览诗》，可能正是因为钱起的风格是：“体格新奇，理致清淡，芟齐宋之浮游，削梁陈之靡曼。”^{[1]（p.265）}郎士元则与钱起“大抵欲同”，二者均是宗尚王孟，偏于清淡，矫入省净一路的。而令狐楚欣赏的诗人如李嘉祐则“与钱郎别为一体，往往涉于齐梁，绮靡婉丽。”^{[1]（p.271）}，同样有六朝遗韵的柳中庸、刘方平等也得到青睐。所以方回说：“唐《御览诗》郑纵四首皆艳丽，令狐楚所选，大率取此体，不主平淡，而主丰硕云。”^{[13]（p.1324）}

除了字面的华美，“艳”字更与诗歌的题材相关。传统上把描述女子行貌或为女子代言或描写两性情感的诗歌列入“艳诗”的范畴，且若不能从中找出比兴寄托，则评价较低。《御览诗》中此类诗歌大约占到六分之一，有些诗句确实辞庸调滥，不免给人浮靡不切之感，也因此遭到讥评贬伐。何焯就在校跋中说：“此书又在《间气集》之下，大抵大历以还恶诗萃于是矣。”^[15]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所谓轻艳绮丽并不相当于“浮靡”，甚而“颓靡”或“宫体”。前文已经论述了诗集中不乏慷慨沉雄之声，《四库全书总目》也

将《御览诗》的整体风格评述为“大致雍容诸雅，不失风格”。^{[6](p.1727)}可见将《御览诗》看成一本以艳情为内容的诗选并不公允。就是那些体涉艳格的诗歌，也并非仅仅是齐梁纤巧之辞的沿袭。如刘方平《采莲》“落日晴江里，荆歌艳楚腰。采莲从小惯，十五即乘潮。”描写异地风土人情带民歌俚语色彩，有新鲜朝气。又如《春怨》“寂寞空庭春欲晚，梨花满地不开门”之不事藻饰而冷落自见，李益《鹧鸪词》“处处湘云合，郎从何处归”之比兴玲珑喻相思无极，均突破了六朝以咏物笔法形容女子的旧习。尤其在心理描写上，诗人以同情之心态切入，从设身处地的角度落笔，则更显丝丝入扣，如：

“新作蛾眉样，谁将月里同。有来凡几日，相效满城中。”（刘方平《京兆眉》）

“偶向江边采白萍，还随女伴赛江神。众中不得分明语，暗掷金钱卜远人。”（于鹄《江南意》）

“欲令遥见悔，楼上试春衣。”（梁锺《长门怨》）

三首诗均写女子娇态，刘诗对女子“新作蛾眉”后正自矜自得的姿态，满城争相效仿后又有几分失落的心理变化承转体贴入微。于诗前两句“偶向”、“还随”两词写出女子“芳心是事可可”的勉强意味，后两句道出缘由，“暗掷金钱”契合“众中不得分明语”，写得细密婉转。梁诗描写女子失宠后，故意新装亮相，要以姿色之美艳令负心者有所悔意，可谓机抒别出。这些描述都没有仅仅以描绘出一幅华艳的仕女图为务，而是对女子心理的变化有着准确的把握，起承转折间错落而有生气，当得上婉而深切，情而有味的评语。故笔者以为，以轻艳二字囊括《御览诗》的风格未必妥当，艳则有之，轻字尚可斟酌。

明朝赵均在《御览诗》抄本前的题词中说：“说者谓其篇中多情至之语，此诗入御，不当如是，以此病之。”^[15]随后又为之辩解：“昔尼父删诗，不废郑南二首首章，《关雎》、《鹊巢》，犹且哀乐洋洋盈耳，何况吾人渐渍，能不从此入耶？盖诗缘情起，不由此入，沁人心骨，必不精至，令狐学士该有所深思在也。”令狐楚是否“有所深思”恐怕是缘于揣测，但点出了“情”字则比贸然斥责其浮靡不经见解深了一步。但这个情与其说是“艳情”，或许用中唐后期被广为认可的“风情”二字更为合适。

元稹在献诗给令狐楚时曾在《上令狐相公诗启》中这样说：“常欲得思深语近，韵律调新，属

对无差，而风情宛然，然而病未能也。”^[16]思深语近，指的是构思曲折精妙，文辞自然流畅。韵律调新，指的是超越较为固定的平仄谱式之上，在音响、格律上的进一步与内容相协的顿挫变化。属对无差，指在炼句上修辞手法运用的工整。而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风情宛然。“风情”在中唐后期是以风尚之姿为人津津乐道的。有学者认为中唐文人拈出“风情”一词不过是为不合风雅的“艳情”粉饰，二者本质并无差别。笔者以为这种理解并不确切。风情并不单指男女相爱的情怀，也指人物的风采风神，泛指怀抱意趣。若用在诗评方面，则是偏于情致方面的要素，不仅需要描绘的事物栩栩然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更须兼顾要眇的意境和倜傥生姿、摇曳人心的感染力。试看被令狐楚列于卷首的刘方平的诗作，十三首中《泛舟》、《折杨枝》、《采莲》、《京兆眉》、《春雪》、《送别》、《夜月》、《春怨》等八首被后人广为注评^{[12](pp.1349—1452)}，有“含情婉转，炼辞雅致”、“诗既妍雅，调亦入古”、“语质而味旨，真风人之遗”、“蕴藉”、“楚楚有致”、“写意深微”、“用心之细、体情之切，俱非易到”等赞语，这或许才是“风情”的最好诠释。若只将“风情”看作男女之情，则不免和晚唐一些轻俗的作品流于一路了。

由此而论，任何诗选家或诗评家都是以当下的审美眼光去选择评价作品的，即使令狐楚选择的对象距离他的“当下”就时间而言并不太远，但《御览诗》透露出的已并非大历、贞元的趣尚，也不应笼而统之地称为中唐的风尚，而是出自其个人对当时文风诗风的理解，富赡中的气格和艳丽中的风情也都可以从元和中后期诗坛的趋向去体会。

总而言之，《御览诗》收入的全部为近体诗，近体诗藉其在应用上的优势逐步繁荣，《御览诗》正是在元和后期，朝廷上下均以声病谐婉相尚的风气间应运而生的。而集内诗歌多可入乐，也是唐朝声诗繁盛的力证。《御览诗》在对诗人的选择上，由于其供奉天子的特殊性质，受到了时势的限制和利益的驱动，未能将一些对后世影响最大，声名卓著的诗人选入，从某种程度上降低了其在诗史上的地位，但这种背离艺术的做法却保存了历史的真实，即元和后期复杂的势态中统治阶层所认可的诗坛面貌。另一方面，也保留了一些后来被历史湮没的诗人诗作。在对诗歌的审美趣味上，令狐楚重视气格上的富丽深厚，也喜好色泽妍艳、饶有情思的作品，而与清淡或者怪奇的风格有相当的疏离。所以其选择的对象虽然有相当属大历诗歌，《御览诗》

却并不是大历、贞元或者元和前期风格的再现。而令狐楚对气格和情致方面的要求不仅是其个人偏好所致,也与元和中后期“中兴”的时势及文人对“风情”的追慕相关。当然,随着大唐国势的下沉,中兴气象也终趋消散,而风情二字若胶着于色相,则不免流于艳情,直接导出了晚唐诗风之纤巧无骨,婉弱刻露。虽然我们并没有确凿的事实来证明晚唐诗坛深受《御览诗》的影响,但陆游在《御览

诗》的跋言中引用到的《卢纶墓碑》上,记录了卢纶的诗歌入选《御览诗》数量高达十分之一的事迹。从谀墓人的夸耀中,我们可以推测:该选集至少为人所知,入选者为人所羡慕,也必然有一定的影响。虽然不能大言《御览诗》的编纂有导引一代诗风的作用,但在唐诗发展史上也应有相应的地位。

(责任编辑 胡范铸)

参考文献:

- [1] 元结、殷璠等选.唐人选唐诗(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 [2] 施子愉.唐代科举制度与五言诗的关系[J].东方杂志,第四十卷第八号.
- [3] 白居易.久不见韩侍郎,戏题四韵以寄之[A].白氏长庆集[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 [4] 元稹.见人咏韩舍人新律诗,因有戏赠[A].元氏长庆集[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 [5] 吴相洲.唐诗创作与歌诗传唱关系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 [6] 纪昀、陆锡熊等纂.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
- [7] 司马光.资治通鉴[M].长沙:岳麓书社,1996.

- [8] 傅璇.唐才子传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2000.
- [9] 柳宗元.与杨京兆书[A].柳河东集[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 [10] 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M].北京:中华书局,1997.
- [11] 许学夷.诗源辨体[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 [12] 陈伯海.唐诗汇评[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
- [13] 李庆甲.瀛奎律髓汇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14] 方回.瀛奎律髓[M].合肥:黄山书社,1994.
- [15] 傅璇琮.唐人选唐诗新编[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
- [16] 元稹.元氏长庆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From *The Poems for Imperial Reading* to Observe the Vogue of Poetic Writing during the Reign of Yuanhe

GAO Chong-hua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Abstract: *The Poems for Imperial Reading* is a rarely extant collection of the Tang writings. Its compiler was Linghu Chu who had a considerable station and influence in political and literary circles during the turn of middle and late periods of the Tang Dynasty. He was commissioned to compile *The Poems*, which should have a special position and value in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Starting from an analysis of its selections of poetic genres, poets and poems, this paper makes a relatively exact orient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style of those poems. What the collection advocated was not a heedless and empty mood pervaded during the reign of Dali, though it embraced largely works written by the poets living in reigns of Dali and Zhenyuan. Its pursuit, as a special and significant case, showed the vogue of poetic writing during the reign of Yuanhe.

Keywords: Tang poetry, *The Poems for Imperial Reading*, Linghu Chu, Yuanhe, genre, style